

词典学概论

[捷] 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词典学概论

〔捷〕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 主编

林书武 宁 渠 冯加方 译
卫志强 周绍珩
胡 明 扬 校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Ladislav Zgusta
MANUAL OF LEXICOGRAPHY
Academia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Prague

词典学概论

〔捷〕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 主编
林书武 宁 桀 冯加方 卫志强 周绍珩 译
胡 明 扬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9017·1032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23 千
印数 12,500 册	印张 15 ¹ / ₄ 插页 1
定价: 1.95 元	

前 言

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国际哲学人文科学委员会提出一份合同(866717号文件),要求了解词典学方面的情况;后一个机构将该合同转给了国际科学协会。国际科协接受了这一要求,最终由C.C. 伯格教授(莱顿大学)将希望了解的事项写成报告。¹

根据该报告的建议,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召开了专门性国际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哲学人文科学委员会部分参与了发起工作),讨论了词典学问题,主要是亚非地区语言的词典学问题。会议的最后决议中还提到希望编写一部词典学概论。

根据会议决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下属委员会开会时不断表示对词典学的兴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约请国际哲学人文科学委员会编写本书。经过国际哲学人文科学委员会的推荐(即按照上述布拉格会议决议所提出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接受了编写本书的任务,并签订了合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遵循合同条款有效地帮助了本书的编写工作。这种帮助对于写出初稿和在真正的国际范围内进行必要的研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支持,我们谨

1. 该报告由国际哲学人文科学委员会作为小册子出版,题为《国际科协提出的关于需要出版迄今尚未编写过的词典的报告》,未注明出版地点和年代。

在此深表感谢。我们也非常感激国际哲学人文科学委员会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也许不可能解决编写过程中在某些方面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和克服反复出现的困难。

本书打算广泛地讨论词典学各方面的问题，但主要探讨单语词典和双语词典。我们希望本书对正在编纂词典或计划编纂词典的人有所帮助。此外，我们还希望，对词典学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和论述将有助于澄清这些问题，并有助于阐明在语言学理论的范围内更有成效地思考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尽管本书的基本特点是这样，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那些词典编纂者，他们所编词典的语言没有悠久的语文学传统，甚至连词典的传统也没有，首先，亚非语言就常常是这种情况。美洲印第安语也没有悠久的传统，但是这些语言所处的环境不同。因此，本书用了一定篇幅讨论这些语言中的某些问题并从这些语言中引用了一些例子。这些有关的例子及其在语言学上的说明系由本书合作者提供。主要由合作者负责编写的某些有关段落通常在前面写明作者的名字，作者名字放在后面的仅属例外。本书其余部分，包括本书的总构思，由本书的主要作者，即在前言上署名的作者负责。本书势必偶尔使用的代词“我”或“我们”所指也是本书的主要作者，例外情况，当在脚注中注明。

词典学中最奇特的现象之一是词典编纂者很少交流过方法上的经验。直到1965年，B.克马达才开始发表报告，介绍正在编纂的词典的计划，讨论编纂的方法和所采用的编写程序。这些报告现在以《正在进行中的词典工作》为总标题陆续发表，其中第一篇报告收在克马达主编的《词汇学杂志》中（第

6分册,1965年出版,第105页以次)。但是对词典编纂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讨论仍然很少。如果我们把讨论各种具体问题的文章略而不谈(本书有关章节将提到这些文章),我们可以首先举出有较广泛理论价值的著作如下:

(1)谢尔巴(Л.В. Щерба)著《词典学基本理论初探》(*Опыт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第1章,刊于《苏联科学院通报》,1940年,第3期,第89—117页。(该文的英文摘要见P. L. 加尔文用英文所写的对该文的评论,载于《词》杂志1947年,第3期,第129—130页)。

(2)迪沃托(G. Devoto)著《昨日与明日的词典》(*Dizionari di ieri e di domani*),1946年,佛罗伦萨(意)版,(关于各类意大利语的描写词典和词源词典的论文集,此书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有不少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

(3)查普曼(R. W. Chapman)著《词典学》(*Lexicography*),1948年,伦敦版。

(4)卡萨雷斯(J. Casares)著《现代词典学导论》(*Introducción a la lexicografía moderna*),载于《西班牙语文学杂志》,1950年,第52期,(该文俄译本以单行本出版,阿鲁丘诺娃译,斯捷潘诺娃主编,1958年,莫斯科版)。

(5)米利奥里尼(B. Migliorini)著《词汇学概要》(*Che cos'è un vocabolario*),1951年,佛罗伦萨(意)版(第2版)¹。

(6)《布拉迪斯拉发词典学论文集》(*Lexikografický sborník bratislavský*), (1951年 布拉迪斯拉发[捷]词典编纂学会议报告论文集), 斯拉夫科学出版社出版,1953年,布拉迪斯

1. 这是 I. J. 盖尔布教授提出来的,第一版日期不详。

拉发。

(7) 《词典学公报》(*Leksikografyčnyj bjuleten'*), 多卷本的词典学论文汇编, 第1集出版于1951年, 基辅。¹

(8) 多罗谢夫斯基(W. Doroszewski)著《波兰词典学的任务》(*Z zagnień leksykografii polskiej*), 1954年华沙版。

(9) 哈尔伯特(J. Hulbert)著《英国和美国的词典》(*Dictionaries British and American*), 1955年伦敦版, (总结了毕生词典编纂工作的丰富经验)。

(10) 加尔文(P. L. Garvin)著《美国印第安语词典和文献编纂中的问题》(*Problems in American Indian Lexicography and Text Edition*), 1955年圣保罗版。

(11) 希厄思(F. Hiorth)著《论词典学的对象》(*On the Subject Matter of Lexicography*), (载于《语言学研究》1955年, 第9卷, 第577页)和“论词典学基础”(*On the Foundations of Lexicography*), (载于《语言学研究》1957年, 第11卷, 第8页以次)。

(12) 《词典学论文集》(*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多卷本的词典学论文集, 已出版6卷, 第1卷出版于1957年, 莫斯科)。

(13) 盖尔布(I. J. Gelb)著《词典学, 词汇学和阿卡德语词典》(*Lexicography, Lexicology, and the Akkadian Dictionary*), (载于《结构主义与历史》, 纪念昂德雷·马丁内的论文集, 卡塔兰主编, 第2卷, 1958年, [西]加那利亚斯版)第63页以次。

1. 感谢 O·莱斯卡告我以此书。

(14) 《词典学问题》(*Problems in Lexicography*), 1960 年 11 月 11—12 日在印第安纳大学举行的词典学会议上的报告汇编, 弗雷德·W·霍斯霍尔和索尔·萨波尔塔主编, 1962 年, 布卢明顿版。(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民谣、语言学研究中心出版物, 第 21 集, 并见《美国语言学国际刊物》1962 年, 第 28 卷, 第 2 期, 第 4 部分)。¹

(15) 欧尔什扎格(L. Országh)著《匈牙利语详解词典的词典学理论和实践》(*A szótáríras elmélete és gyakorlata a Magyar nyelv értelmezo szótárában*), 1962 年, 布达佩斯版(我未能广泛地使用这本匈牙利语的书, 欧尔什扎格著作的俄文摘要载于《词典学论文集》1962 年, 第 5 卷, 并参见欧尔什扎格的“匈牙利新词典的原则和问题”, 刊《语言学杂志》, 1960 年, 第 10 期, 第 211 页以次)。

(16) 乌尔班奇克(S. Urbańczyk)著《词典, 其类型与使用》(*Stowniki, ich rodzaje i użyteczność*), 1964 年, 弗罗茨瓦夫出版。

(17) 雷伊(A. Rey)著《词典: 形式和内容》(*Les dictionnaires: forme et contenu*), (载于《词汇学杂志》第 7 卷, 1965 年, 第 65 页以次)。

(18) 马西厄特(M. Mathiot)著《词典在语言描写中的地位: 问题和意义》(*The Place of the Dictionary in Linguistic Description: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载于《语言》杂志, 1967 年, 第 43 期, 第 703 页以次。

1. 参见 K·D·乌伊蒂的详细评论, 载于《罗曼语文学》杂志, 1962—1963 年, 第 16 期, 第 416 页以次。

(19) 瓦里希(G. Wahrig)著《词典工作的新途径》(*Neue Wege in der Wörterbucharbeit*, 图书销路研究所报告, 特刊), 1967 年汉堡版。

(20) 克马达(B. Quemada)主编的《词汇学杂志》(*Cahiers de lexicologie*); 虽然该刊并非专论词典学, 但刊有这方面的许多论文, 论及词典学的最重要的各个方面。(第 1 卷出版于 1959 年)。

以上开列的是迄今为止系统地讨论词典编纂者的经验和词典编纂工作中所贯串着的理论问题的最广博的著作。我们希望这些著作的发表很可能标志着对词典学问题的兴趣在不断增加。勿庸置疑, 上述每一部著作对我们的工作都有极大的帮助。因此, 在本书中, 凡是认为必要的地方我们都明确地表示我们的谢意。但是要对我们在思想上所获得的每一点启发都一一致谢也许是不大可能的。

目前, 词典编纂工作中取得的经验还没有普遍传播(至少没有在国际范围内), 词典编纂法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细心地研究手头的好词典。在这方面, 我的确力图把我的著作建立在对不同语言的各类词典进行普遍研究的基础之上。¹ 其中某些词典对我的帮助比别的词典更大, 因为我从这些词典积累的经验中得到很大的教益。我想, 在这方面我受益最大

1. 但应强调指出: 本书既非对现有词典进行综述或评论, 也没有开列全部词典的书目。(普尔格拉姆在这方面作过很好的评论, 见《词》杂志 1947 年第 3 期, 第 222 页)。由于明显的原因, 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手头的各种语言的词典, 以便获得某些必要的材料。当然我们更乐于使用好词典,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引用过的词典就是绝对地好, 或者只有这些词典才是好的。这也并不意味着本书没有引用的各种具体语言的词典就一定不好。

的首先当数某些捷语词典，需知人们毕竟对本族语的细微奥妙之处最容易理解，理解得最快、最全面。在这方面，我非常有幸，得以使用捷克科学院捷语研究所出版的杰出的捷语词典：《捷克文学语言词典》（第1卷于1960年在布拉格出版，以后各卷陆续出版）。这部卓越的著作是积累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使我获益匪浅，仅能在此表示总的感谢，恕难在每一场合下重述。在双语词典方面，同样应举出I·波尔达乌夫编的英捷和捷英词典（其中主要是《捷英词典》，1959年，布拉格版），我在此也只能表示总的感谢。第三，我曾有幸参加许多词典的编纂工作，担负过各种职务，从直接指导编写到担任顾问或参与讨论。这些活动的主要中心是布拉格东方研究所，柏林的德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等单位。我和编纂各类词典的同事们讨论了各种问题，从中得到的教益是难以完全表达出来的，但是感谢的心情是同样热烈的。最后，我有幸将本书的很大部分在芝加哥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加利福尼亚大学（勃克利）和斯坦福大学等所属词典中心进行过讨论；本书手稿或部分手稿曾经下列学者过目：B·阿巴耶夫（莫斯科）、O·C·阿赫曼诺娃（莫斯科）、B·弗雷瑟尔（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E·汉普（芝加哥）、J·菲利普克（布拉格）、I·J·盖尔布（芝加哥）、P·加尔文（洛杉矶）、D·J·乔加卡斯（大福克斯）、O·列什卡（布拉格）、M·马西厄特（洛杉矶）、I·波尔达乌夫（布拉格）和已故的U·怀恩赖希（纽约）。他们对本书提出过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谨致谢忱。在有关的地方我们将提到这些意见和建议，虽然不可能对每一个细节都表示感谢。我还要十分感谢许多同事对此书英文版的指正。但最后的责任，特别

是英语例子的选择和解释的全部责任¹应由我担负;其他所有未特别注明由哪位提供的例子也由我负责。

L·兹古斯塔

1968年5月于布拉格

1. 对英语词汇单位多义现象的分析和条目安排直接引自以下三部词典或从中得到过启发: 荷恩毕(Hornby)等三人编的《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词典》、《牛津简明现代英语词典》和《韦氏英语大词典》(第三版)。所有重要的和大部分不太重要的例子都特别注明了出处。我们从荷恩毕等三人编的词典中采用了许多释义的例子和释义的其它方法。可能某些读者不同意其中某些词义分析和条目安排;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个说这种话的人之间有分歧(参阅我对捷语例语所作的说明)。但是,英语例子较易处理,因为目前广泛采用的方法是不加区别地用比如说从奥什科什来的,或从拉雷多来的,或从波士顿*来的人的说话标准来测验某些句子和表达方式是否可以接受,而上述词典的编者本人毕竟是或者曾经是操英语的本族人,那么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也以他们作为标准呢?

* 这三个地方分别位于美国的北部、南部和东部。——译者

导 论

0. 毫无疑问，词典编纂工作是语言学工作中非常困难的一个领域。许多词典编纂者都表露过这方面的感受，其中最动人的大概要数J·J·斯卡利格(十六——十七世纪)根据他编纂词典的长期经验说出的一段话。他用优美的拉丁诗句说过：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当代学者H·A·格利森¹更加言简意赅、但仍一语中的地说过：“词典编纂工作极端令人厌烦，要求十分苛刻。这是一项大得难以置信的工程。”

0.1 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此时此刻试图孤立地列举这些困难无补于事，因为从全书将可以看到这些困难。然而，至少提出下列几种困难是有所裨益的。

首先，人们可能非常简单并且天真地说：“词典编纂者应该什么都懂。”虽然词典编纂者集中注意的是他对词汇单位(通常是词)最关注的那些特点(首先是词汇意义的不同方面、也还有词汇单位的语法特点)。但是我们将看到：词典编纂者为了把工作做好，就不仅必须考虑该语言的整个结构，而且还应考虑到该语言集团的文化的¹所有方面。这不过是两个突

1. FL 88。

出的领域。《词典学论文集》¹第一册的编者在前言中说过：“词典学理论涉及研究词汇系统的所有学科，如语义学、词汇学、语法、风格学……”。这一说法得到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响应，有人说同样正确的话：“词典是……所有和言语行为有关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系统的汇合点。”²我们不应忘记，词典编纂者处理的是开放类型的现象，因为词的数量一般是无限的；如果有需要，就造出一个新词，或赋予一个现有的词以新义，等等。因此，词典编纂者永远无法知道他收集到的资料是否完全（实际上永远不会完全）或者至少是否充足，且不说他的工作通常还要受到财政上和时间上的实际限制。此外，语言的变化甚至可以很快使词典编纂者十分审慎地作出而在当时还是正确的解释和按语变得过时，这种语言变化的因素，词典编纂者也无法消除。

其次，词典编纂者集中注意词汇单位的意义，这一事实本身就含有许多非常特殊的困难。我们在论及词义的那一章中将看到我们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但是事情还不仅如此。许多语言学家在过去数十年中希望只做通常叫做客观上可检验的论述，避免做任何主观论断，这种愿望和其他类似的原因，已经引起对语义学问题的某种忽视，甚至有人对于意义这种可疑的概念抱有反感。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这样说是正确的，即：描写的方法和程序非常注重形式，通常只有当需要找出什么是在语言学上有关的成分并找出它是怎样才成为有关的成分的时候，才一般考虑到语义。这种态度本身不一定有什么错

1. LS 1, 1957, 3.

2. Gleason PL 101.

误。我们在以下的讨论中将看到：语义是通过语言形式体现的。没有形式，就没有意义，只靠这一点才使语言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但是，当格利森¹这样说的时侯，肯定是正确的，他说：“象现在所做的那样，[这种编写词典的]工作过程非常不同于描写语言学家感到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然而，应该说，如果由此产生一种印象，以为词典编纂工作中的困难多少是由某些描写语言学“学派”的某些特点所引起，那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描写学派的影响迄今为止相当有限（或在某些情况下过去曾经是有限）的那些国家中，同样感到了这些困难。

第三，我们不要忘记词典编纂者做的虽然是科学工作，但使用词典的人所追求的却总是较实用的目的，至少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考虑是这样。有人可能以为这一说法只适用于一般公众使用的多少带有商业性质的词典。其实刚好相反，这一说法适用于任何词典。以《拉丁语词典》或《亚述语词典》为例，使用这些词典的人自然从来不是“一般公众”，而只是学者。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和在类似的情况下，词典编纂者也不应忘记：查考词典的学者通常不是以编纂词典为职业，他们没有或者不大有词典学的素养，既不懂词典编纂者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材料的全部意图，也不明白决定词典编纂者如何解决问题和如何编写词典的动机。由此可见，即使是这种十分专门的词典，其使用者主要关心的是在词典中查阅资料，较少注意纯粹词典学方面的特点。通常人们并不会把词典从第一页读到最末一页，而是查阅单个词条。因此，每条词条可

1. PL 88。

以说都必须自给自足；而不要指望使用词典的人在查阅该词条以前，会对词典学的总的问题有太多的思考。一部好的、有用的词典，其基础是好的理论，但另一方面，使用词典的人，主要关心的不是探讨词典学的许多理论，也不是探讨编纂工作中提出的一系列词典学问题，而是要寻找与此迥然不同的材料，即关于某个语言本身的种种事实的解释。换句话说，使用词典的人至少通常并不希望词典提出纯粹属于词典学的问题，而是希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不仅有充分理由说，大多数词典必须始终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需要，¹而且还必须说，“只有当词典中所包含的理论不是强加于人的，对一般读者不造成什么障碍时”，²才称得上一部好词典。词典编纂工作的这种双重性质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附加的困难。

0.2 更使人感到惊愕的是：“词典学对它本身的方法论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³的确，除开某些例外的著作以外（其中几部最重要的著作已在前言中提到），很少讨论到纯粹的词典学问题。我们发现的，至多是分析孤立的问题，关于正在编写或计划编写的词典工作进展的报导，以及评介已出版的词典。但是，“词典学理论应高于词典的编辑大纲、或编辑凡例。”⁴

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于此种情况有所裨益。我们相信：对词典学的各种问题（或至少其中较重要的问题）进行

1. Ďurovič LSB 65.
2. Havránek, *Poznani* 189.
3. 怀恩赖希(Weinreich) PL 26.
4. LS 第一集编辑部文章, 1957, 3.

系统的讨论,如果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话,至少也有助于对这些问题有更好的了解,有助于找到较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还相信:这样一种系统的讨论是有益的,因为我们认为,不久的将来将比以往更加注意词典学问题(连同语言学的其他邻近学科)。在实际应用方面,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各种不同语言的教学,各种不同语言的知识,不同社团之间的接触,正在日益扩展。在理论方面,迄今为止语义学相对地说一直十分不受重视,以致显然开始成为人们的注意中心,如果不是由于别的原因,那就仅仅由于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造成了压力。此外,我们不应忘记:正是“词汇”和“语法”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不仅对诸如生成语法之类的许多理论问题,而且对机器翻译一类事业,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0.3 除上述总的目的外,本书还意在特别对亚洲和非洲的词典学的发展有所裨益,首先对该区域的现代标准民族语的词典学发展有所裨益。

0.4 本书力图分析词典学中包含的种种理论问题,或至少概述其中较重要的理论问题。与此有关的是必须讨论到普通语言学的某些问题,尽管本书并非必须进行语言学上的理论探讨或以此为前题。¹

我们还想声明以下两点: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列出详细的、更不必说概括无遗的文献目录的原因。我们的方针是尽可能只指出那些专门论及词典学,或主要同词典编纂理论和实践有关的出版物。

第一、我们并不认为,本书所采用或提出的理论观点是唯一可行的,我们只是想提出那些根据我们的经验对词典编纂者来说,是最有用的,或者说,是最切合实际的方法和观点。第二、本书所提出的某些语言学观点显然比较保守。这不仅是个个人偏好的问题。词典编纂工作中,传统起的作用很大。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为某种语言编一部卷帙浩繁的学术性词典,谁也不会感到惊讶。计划编一部中型词典,至少需要十年,也是理所当然。一部好词典一旦出版,就可以用许多年,新版本通常不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该词典的理论基础。斯莱德(Sledd)¹ 说得很对:“词典编纂者不能因为‘词汇’这棵大树的树叶一有风吹动就跟着改编”。² 词典不能老是改编,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词典编纂者有责任遵循传统,还因为词典正在进行编纂时,不可能任意改变已经决定和确定下来的事情、方法和程序。词典学是一门传统科学,在最近的将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性质仍不会改变。当然,如果更加关注词典编纂学的理论,如果研究、试验和采用新的工作方法或者新的编写方式,事情或许会稍有改变。只有当词典学及其有关语言学科将来可能有所发展时(这一点将在 §8.5 中进行讨论),才能设想有较根本的改变。

格利森³ 说得很对:“当前(词典学)的做法,基本上是一种不断积累的传统的结果”。因此,本书所试图做的事情,只是简单地论述这一传统,换言之,则是汇集我们这一部门工作

1. PL, 第 147 页。

2. 看来这句话得根据现代的情况改说成:“词典编纂者不能因《语言调查委员会》每发表一次调查报告就跟着改编”。

3. Gleason PL 90。